

李敖 大全集

2 李敖回忆录

李敖
大金集

2

李敖回忆录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编撰说明

一、1999年1月，中国友谊版《李敖大全集》(1—20卷)在北京出版。逾年，《李敖大全集》(21—40卷)面世。十载光阴，世事沧桑。对李敖先生洋洋四十卷大著重新进行修订、梳理和再编辑，实属必然。

二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将李敖先生的一千四百余言著述，按“文学与自传”“人物专题研究”“传统与文化专题研究”“历史与时政专题研究”，以及“私房书”和“杂写集”六大主题分类编排，摒弃了原台湾版“合订本式”的编撰方式。

三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收录李敖先生的著述更为丰富、全面。与十年前出版的“大全集”相比，增加的篇目文章字数总计一百四十余万言。

四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，仍沿袭与李敖先生约定的基本原则，即“只删不改”“删节段落用省略号表示，并标明‘编者略’”“未采用之篇章在卷首目录中标明”，以期尽可能保持李敖先生著述的全貌和原貌。

五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，遵循有关规定，对涉及不能为大陆读者认同的政治取向的内容做了技术处理；对学术思想及观念上的差异则保持原貌；对台湾党政机构名称和职务称谓，采用加引号的处理方式，但引文内和引号内的则不再加引号。特此说明。

在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即将付梓之际，衷心感谢李敖先生长期以来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信任，将他几乎全部著作的中文简体字版本交由我公司在祖

2 | 李敖大全集(卷2)

国大陆出版。衷心感谢新闻出版总署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,对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出版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;感谢其他所有为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出版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朋友;并诚恳期待各界读者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予以指正。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年12月

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编撰说明/1

《李敖回忆录》(1—286)

如果台湾没有李敖……(何飞鹏)/3

自序/6

哈尔滨(1935—1937·一到二岁)/7

北京·太原(1937—1948·二到十三岁)/15

上海(1948—1949·十三到十四岁)/29

台中(1949—1954·十四到十九岁)/39

台大(1954—1959·十九到二十四岁)/57

军队(1959—1961·二十四到二十六岁)/68

山居(1961—1962·二十六到二十七岁)/78

文献会(1962—1963·二十七到二十八岁)/92

《文星》(1962—1966·二十七到三十一岁)/106

星沉(1966—1970·三十一到三十五岁)/123

软禁(1970—1971·三十五到三十六岁)/138

监狱(1971—1976·三十六到四十一岁)/157

隐居(1976—1979·四十一到四十四岁)/176

复出(1979—1981·四十四到四十六岁)/194

“二进宫”(1981—1982·四十六岁)/211

笔伐(1982—1992·四十七到五十七岁)/22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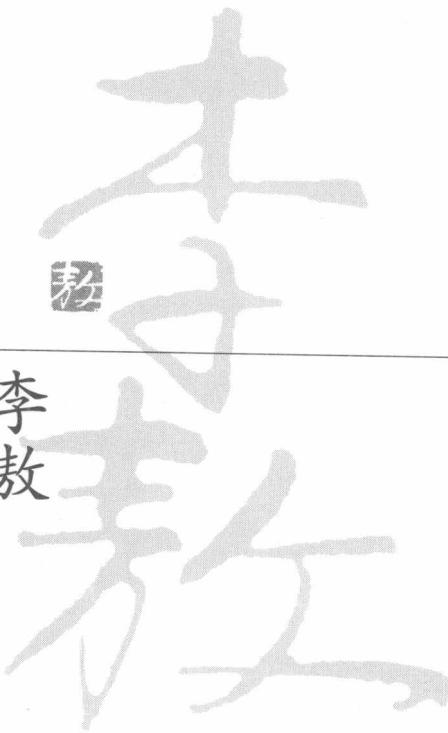
口诛(1993—·五十八岁至今)/245

前程(1997—·六十二岁以后)/262



目录

李
教
回
忆
录



如果台湾没有李敖……

何飞鹏

十几岁年轻的时候,没有机会认识李敖,只能偷偷的读他写的《传统下的独白》,感觉李敖似乎颠覆了所有学校中所受的教育。

那时候所知的李敖,是个一袭长袍、特立独行的台大学生,学问足以与大师胡适往来、论战,无疑是个梦中的未来英雄。

这个未来英雄,并没有按照我年轻时的想象,成为体制内认同的当代大师、思想家、文豪或者史学家(年轻的我,对体制尚有高度敬畏,当然李敖是体制外的英雄毋庸置疑),接下来只有断断续续的印象:与《文星》纠缠不断的官司,退出江湖卖牛肉面去,成为思想犯坐牢,出狱后复出江湖,与名女人胡茵梦结婚、离婚,继续放言高论,与当权者斗争,办《求是报》,以一人之力办报,其文字的产量,最令身为记者的我由衷佩服。

这些远观(无缘认识前)的片断,串成了对李敖的想象——一个当代具有“特异功能”的人:博览群籍,巨笔如椽;指责当道,不惜坐牢;挑战禁忌,不屑媚俗;朋友多,敌人多,女朋友更多。可以肯定的是,这位当代奇人的人生绝对是彩色的,一生中充满曲折变化、高潮起伏、快意恩仇的故事。

在偶然中,我由记者变成出版人,也在偶然中,我成为李敖著作的出版商,从《蒋介石评传》《你不知道的彭明敏》《你不知道的司法黑暗》,连续几本书的出版,让我对李敖的印象,从远观的片断,逐渐鲜活起来。

而这几年,恰好也是台湾变化最大的阶段:从后蒋经国时代,步入李登辉

独揽大权,从国民党一党独大,到三党鼎立,从社会富裕稳定,到变乱、危机四伏,这一阶段的李敖,其实著作已不多(相较其之前的数量),但却用另一种形态冲击台湾社会,对抗当权者。

电视节目《李敖笑傲江湖》,使李敖的舞台由平面而立体,由学术政治圈而及于社会大众,当然一些片断的新闻,诸如代朋友打赢两亿多的保险理赔案,举办李敖收藏古董拍卖会,不时臭骂“总统”李登辉以及各阶层、领域的名人等,李敖仍是不折不扣的奇人,年虽逾耳顺,仍扮演着笑傲江湖、快意恩仇的角色!

平心而论,新的电子媒体创造了全新的李敖,让认同李敖的人,每天可以充分接触李敖。可惜的是,不论是思想家李敖、史学家李敖或者“最伟大的白话文作家”李敖,现代年轻的读者们,如非特别有心,相信都无缘认识李敖这些传统的一面。

不论是新的李敖或传统的李敖,不变的是:与整个台湾社会纠缠不清、无役不与的李敖。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,政治人物蒋氏父子、李登辉之流,用他们无所不在的权力搅动台湾社会,但也仅限在位之时。而李敖过去数十年,却凭他一己之力,与政权对抗、与历史互动,搅动社会,参与改变!

想想看,如果台湾社会没有李敖,政治言论是不是充斥谎言与教条?如果没有李敖,1949年之后的台湾产生引领风骚的大师级人物的期待,是否就此绝望了呢?如果没有李敖,台湾民众对司法体系的痛恨与怨气,将完全找不到纾解!(李敖为自己打赢官司,当然也宣泄了民众对司法黑暗的不满。)如果没有李敖,台湾无耻的政客们,是不是更为所欲为呢?如果没有李敖,台湾社会肯定无趣许多,李敖已是台湾社会重要的一部分!

李敖还有更多特立独行的小地方,值得社会大众一窥究竟:李敖藏书之丰,媲美政府图书馆;李敖不用电脑整理资料,建立档案,但资料之完整,让他评论任何事,都可以事事举证,接近无懈可击;李敖骂遍天下名人,却安然无恙,自有其一套骂人哲学;李敖从不离开台湾,因为他是真正爱台湾的人;李敖言人所不能言、言人所不敢言,凡此种种皆引人入胜!

“不管你喜不喜欢李敖、认不认同他的言论,李敖一生的变化起伏,绝对值得台湾人探究。”这是我从远观李敖,到结缘李敖,到出版李敖所得到的不变的结论。

因此,从几年前,就一直希望李敖能将一生回忆,整理成书,现在终于在李敖先生六十二岁前夕,得以如愿,期待与所有想了解李敖的人,共享他一生的传奇故事!

毕竟自以为了解李敖的人,都只摸了四条象腿,但谁又能真正了解这位宣称“人生八十才开始”的李敖其一生的恩怨情仇。

出书前夕,李敖因病住院开刀,躺在病床上仍努力写稿,以如此投入的心力,肯定李敖以此书为其倾力代表作。

李敖出书从不邀人写序,现得其厚爱命作序一篇,我为自己捏把冷汗,但想到李敖的朋友和敌人,以及广大的读者翘首企盼此书,我责无旁贷,只有硬着头皮草就此文以为序,并盼不要因为此文的不当成为李敖的被告。

自序

1997年我六十二岁，六十二岁对一些人是尴尬年纪：蒋介石六十二岁流亡台湾，他尴尬，“树倒猢狲散”，是谓尴；“吃力不讨好”，是谓尬；我六十二岁拥抱台湾，我尴尬，“人老心不老”，是谓尴；“无可无不可”，是谓尬。古人讲三不朽：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蒋介石无德可立、无功可表，倒是言论总集出了一大堆，但都是文字大便，等于无言可垂。此人崛起于乱世，才具不足，对乱世无能为力，却拼命使劲，结果弄得“我志未酬人亦苦”，尴尬以死，必矣！至于我呢，也崛起于乱世，因无机会、台湾又小，故乏事功足述，但在立德立言上，却自喜成就非凡。不过，活到六十二岁，虽“人老心不老”，毕竟宝刀渐老；虽“无可无不可”，毕竟力难从心，尴尬之情，不可掩也。何飞鹏先生嗜老成性，居然把我锁定，诱以重利，强为他著书，命写回忆录交卷。我自感身处乱世，却一生倨傲不逊、卓尔不群、六亲不认、豪放不羁、当仁不让、守正不阿、和而不同、抗志不屈、百折不挠、勇者不惧、玩世不恭、说一不二、无人不骂、无书不读、金刚不坏、精神不死，其立德立言，足以风世而为百世师，故欣然同意开写。信笔所之，纵迹大纲、情怀小样、忽正忽俳、启手启足，又何尴尬之有？书成之日，自序始末以质今之信女善男，并俟后世圣人君子。

哈尔滨

(1935—1937 · 一到二岁)

1935 年的世界是一个多变的世界。这一年在世界上，波斯改国号叫伊朗了、英国鲍尔温当首相了、墨西哥革命失败了、意大利墨索里尼身兼八职并侵略阿比西尼亚（今埃塞俄比亚——编者）了、法国赖伐尔当总理了、挪威在南极发现新大陆了、德国希特勒撕毁《凡尔赛条约》扩张军力了、捷克马萨利克辞掉总统职务了、土耳其凯末尔第三次连任总统了、菲律宾脱离美国独立了。这一年在中国，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内斗内行，大力“剿匪”，逐共中原；但外斗外行，对日本鬼子卵翼的政权，瞪眼旁观、无能为力：在长城以内，殷汝耕成立了冀东政府；在长城以外，溥仪头一年就称帝于“满洲国”，那正是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两年半，也正是蒋介石丧权辱国、贯彻“不抵抗主义”后两年半，1935 年到了，两年半变成了三年半，“满洲国”使中国东北变成了“遗民”地区，而我，就是“遗民”中的一位。

1935 年 4 月 25 日，我生在中国东北哈尔滨。那时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，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三年七个月，中国东北已是日本鬼子控制下的“满洲国”。照历史的说法，我一出生就是“遗民”，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“遗民”一样。不过，孔夫子做“遗民”，做来做去，是给不同的中国统治者做“遗民”，但我却一生下来，给日本鬼子卵翼的中国末代皇帝做“遗民”，所以，我比孔夫子还窝囊。

我出生时候，还流行用阴历计算，所以一直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时

(上午7至9点),我的小名也叫“安辰”。乙亥年生的属猪,三月二十三日的生日一直按阴历过,直到我二十岁前查出是1935年4月25日,此后我就放弃阴历生日了,阴历太落伍了。不料,我快六十岁的时候,二姐从大陆来,她断言我的生日不是阴历三月二十三日而是三月三日,二姐的记忆力一向过人,所言如不虚,则我的阳历生日是4月5日才对。不管怎么算,我生在1935年4月间,这年4月前后,世界上也生了不少“名流”:世界三大男高音老大帕瓦罗蒂、歌星“猫王”普利斯莱、导演伍迪·艾伦、没脱光的影星阿兰·德隆和脱光照裸照的影星毕雷诺斯等皆属之;中国的女明星尤敏、妖僧达赖喇嘛、蒋介石的长孙蒋孝文,也都生在1935。当然,同是1935年生的人也有贤有不肖,神棍达赖与纨绔蒋孝文,自属不肖之例。国民党在台湾的当权派,1935年生的也正当行,自“司法院”施启扬以下,全是不肖之徒,不单属猪,根本一窝猪耳!

我虽生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,但我的籍贯,却源远流长。我小时候,每见过年,家中即捧出“李氏宗谱”上供桌,一起列在香案上,受焚香膜拜。这部宗谱后来带到台湾,归我保存。根据“李氏宗谱”,我的远籍实际是云南乌撒。据《元史·地理志》:“乌撒者,蛮名也。所辖乌撒、乌蒙等六部。后乌蛮之裔,尽得其地,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。至元十一年始附,十三年立乌撒路。”乌撒路包括现在云南镇雄县和贵州威宁县;到了明朝,改为乌撒卫,就是现在的威宁县。“李氏宗谱”上说是明太祖洪武年间自乌撒迁到山东潍县(潍坊)的。洪武十四年(1381)秋天,明太祖曾派傅友德为征南将军,带兵三十万征云南,那次人民的北移,是强迫性的。我的祖先,很可能是苗族。而照人类学家凌纯声等的研究,苗族的支流,渡海来台湾,成为高山族的一部分,所以,我是台湾高山族的族人,而目前自称真正台湾人的福佬与客家,比起高山族来,其实是假台湾人,或是喧宾夺主的台湾人。

我在云南乌撒的祖先迁到山东潍县后,累世做小百姓,虽在潍县五百年,但是乏善可陈、无恶可作,绝无“名流”出现,也一直安土重迁,直到我爷爷(祖父)出来,才有了大变化。

爷爷名叫李凤亭,他不会写这三个字。他生在潍县,时间约在清朝咸丰元年(1862)前后,也就是中华民国前五十年前。他小时候,赶上荒年,跟着母亲去做乞丐。一天碰到狗来咬,他母亲怕他被咬到,就用身体保护他,母亲却被咬致死。他流浪一阵,无以维生,就替“下关东”的人赶马车,也去“下关

东”。所谓“下关东”，是专指山东、河北等省的穷人，朝山海关外的东北偷渡。东北是满洲人的老家，满洲人入关建立清朝后，把东北划为禁区，除了发配罪犯，禁止汉人去东北。所以当时中国的东北，就像英国的澳大利亚一样，只是罪犯的大本营。顾贞观《金缕曲》中“季子平安否”所指的吴汉槎，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囚犯。但是，东北地大物博，它的富庶，对山东、河北等省的穷人，的确构成大诱惑。这种诱惑，使禁区禁令成为废纸，大量的汉人纷纷“下关东”，在白山黑水之间，驰骋犯难，就像美国“去西部”一样。1904年，日本和俄国打仗，千古怪事是，这两个国家打仗，战场却在第三国——中国的东北。东北这时候，已经有四百万人口，这些人口的压阵，使日本、俄国在瓜分东北上，产生了不少阻力。满洲人再也没想到：禁止到他们老家的汉人，却在阴错阳差之中，替他们看住了老家！这些看家的开拓者中，有一个满口山东口音的壮汉，就是我的爷爷李凤亭。

爷爷活了八十三岁，其中有六十年在东北度过，他的一生，充满了行动与传奇。他做过赶马车的、工人、农民、打更的、看坟的、流氓、土匪、打土匪的、银楼老板等等，名目繁多。爷爷虽然不识字，但是胆大心细，头脑清楚，是有名的厉害角色。有关他厉害的一个故事如下：七十多岁以后，他和大爷（大伯父）大娘（大伯母）住在郊区，一天晚上，来了一伙土匪，把家包围，在墙外高叫开门。大爷大娘已吓得面无人色，但是爷爷却镇定异常。他下令大爷大娘在室内大声吹警笛，自己却拿起一根张飞用的武器——丈八蛇矛，从前门跑到后门、从后门跑到前门，向土匪呼啸叫战。土匪们弄糊涂了，他们绝没想到：居然有这么一个倔强不怕死的老头子，手拿丈八蛇矛，坚持保卫家园，毫无让步之意。大概他们被这种从来想象不到的英勇行动震慑住了，最后他们决定撤退，一个土匪从墙头朝爷爷开了一枪，子弹打穿了窗上玻璃，打碎了窗台上的花盆，最后打到衣柜上。这个衣柜，一直跟着我们，最后运到故都。柜上一个圆坑，就是子弹的旧痕。这个旧痕，表示了人间大勇是什么。

另一个有关他厉害的故事是：他做流民时代，一天在农田里设赌局，做庄家。聚赌的人里，有一个流民某甲，手气不佳，每局都输，现金先输光，接着马输光，接着行囊输光，接着外套输光。最后他输火了，拔出刀来，在大腿上割下一块肉——开始“肉赌”。肉赌是一种无赖的赌法，赌徒赌火了，一割肉的时候，庄家若不巧输给他，不能赔钱，只能赔肉。明朝大宦官魏忠贤，年少无赖，

做赌徒输了,就表演肉赌,他割的不是大腿,而是他的生殖器!(庄家若输,也得割生殖器!)一般说来,赌徒一表演肉赌,庄家必须大量赔钱,破财消灾,免得万一输,就要以肉赔肉。某甲这次表演肉赌,大腿上肉血淋漓往台面上一摆,大家都相顾失色。不料这时做庄家的李凤亭先生,却面不改色的说:“好小子!你来这一套!割起腿上的肉来了!你有种!可是你给我搞清楚,这一套别人吃你的,我李凤亭不吃!你肉赌,按规矩,不是我输了才赔你肉吗?不是我输了再割都不迟吗?不是我赢了就不割了吗?可是为了不怕你,为了比你小子还有种,我先割给你看!割下来,我赢了,就算白割了!”说着,就拔刀朝自己大腿上割下肉来。这个以狠对狠的故事,我没法证实,但听说是爷爷的杰作。这一杰作,使我想起《吕氏春秋》中“齐之好勇者”互相割肉下酒的故事。

爷爷和奶奶(祖母)结婚,也有一段故事。爷爷做土匪,受了伤,躺在山洞里,被奶奶看到了,大力救他,后来就结了婚。奶奶是热河人,也姓“李”,因为中国传统同姓不婚,所以用瞒天过海,改姓“吕”。奶奶长得不怎么样,爷爷一骂她,就骂“穷山恶水,丑妇刁民”!“丑妇刁民”很有个性,她在七十多岁去世前,还跟八十二岁的丈夫斗气不讲话,他们在儿孙包围下,合照了相,可是尽管照相,话还是不说。

爷爷去世前,同我家住在一起,我常到他屋里玩,那时候我四至六岁,看他在后院亲自动手搭棚子、看他烧鸦片烟(烟土太贵,抽不起,只把鸦片烧成小黑丸吞服),跟他的感情极好。他过的最后一个旧历年,我从大年三十就不断的给他磕头拜年,一会儿就去磕一次,然后相对大笑。爷爷说:“这小子今年怎么回事?怎么老是向我磕头,磕个没完?看这样,要把我给磕死了。”

年过了以后,在奶奶去世第一百天那天,爷爷到庙里看给奶奶做佛事,佛事做完了,他向和尚们说:“我不会再来了,再来就是麻烦你们了!”当天晚上,大爷到我家来,陪爷爷过夜。爷爷向大爷和爸爸谈京戏,谈得兴高采烈。谈完了,要睡觉了,爸爸回到房里。不久大爷过来敲门,说爷爷说他不行了,大家赶过去,想找寿衣替爷爷穿(寿衣很多件,穿起来很麻烦。习惯是在人咽气前穿好,一咽气,就不好穿了。但人咽气前经这么一折腾,实在有速死的可能),慌乱之下,寿衣没找到,这时爷爷说寿衣在哪个箱子里,大家找出来,替爷爷穿好,他就死了。他死得如此清醒利落,真是高人的死法。

不久运来棺材，这棺材是爸爸在爷爷生前定做的，用千百年柏树为材料，是上品。那时候，流行生前备好寿衣寿材，老人家都要试穿试躺一次，爷爷奶奶都试过。爷爷试的时候，很高兴，他们那时代的人对“慎终”“送死”都极重视，也毫不忌讳。只有后来的人，才那样远离死、漠视死，死得那样没有准备（中国古制帝王即位后，便预造内棺——“椑”，表示人要存不忘亡、要时时面对死亡。“椑”不但放在皇宫里，出巡时也要随着车队，以“椑车”一辆，跟着皇帝走。这个制度，到唐明皇时才废掉。可见古人对自己的棺材并不忌讳）。

出殡时候，爷爷的子孙媳女大排长龙，大爷是长子，第一名，依次为爸爸、三叔、五叔、六叔、大哥、我，全部男性领先。在我后面是大娘、妈妈、三婶、三姨（即五婶，因她是妈妈的妹妹，所以只叫三姨）、六婶等。这种排名次序，充分看出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。

东北大学副校长李锡恩说他生平佩服的人是我爷爷，我生平在勇敢、强悍、精明、厉害、豪迈上，常“有乃祖风”，也是由佩服爷爷而来。

大概大爷的村学究使我爷爷不满意，大爷自己也愿成全弟弟念更好的学校，于是，在父兄的帮助下，爸爸考上了国立北京大学。本来籍贯是山东省潍县，因为领吉林省公费，籍贯就改为吉林省扶余县。当时只是爸爸一个人改，所以只他一个人是吉林扶余，爷爷和我们仍是山东潍县。这种情形，一直到1949年（民国三十八年）到了台湾，才被户政机关命令统一，从此我也是吉林扶余。这件小事，反映了籍贯自由的嬗变。在政府权力愈来愈大的时候，这点小自由也都不容于台湾了。

爸爸名叫李鼎彝，字玑衡，生在1899年（民国前十三年），1899年是己亥年，就是戊戌政变后一年。1920年（民国九年）进入北大国文学系。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，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。蔡元培是他的校长，陈独秀、胡适、周树人（鲁迅）、周作人、钱玄同、沈尹默等等是他的老师。他的同班同学，后来较有成绩的，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、冯沅君，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，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、陈雪屏。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。他在1926年（民国十五年）毕业，吉林省府想公费送他留学，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，急于回家乡养家，所以就拒绝了。因为是“京师大学堂”毕业的，回到家乡，非常拉风，不但做了东北大学讲师，并且立刻被聘为哈尔滨吉林六中校长，当时的待遇极好，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。当时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

敬,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。爸爸说:军阀张作霖,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,脱下军装,换上长袍马褂,跑到各个学校,向老师们打躬作揖,说我们是大老粗,什么都不懂,教育下一代,全亏诸位老师偏劳,特地跑来感谢。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;也不敢颁发训词教教师研读的。比起又致训词又发训词的国民党来,军阀太可爱了。

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长外,也在吉林女子师范、吉林大学兼课。他唯一一部著作——《中国文学史》,也写在这个时期。这部《中国文学史》,后来由我加上长序,由文星书店印出来,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,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,才免于被查禁。

妈妈名叫张桂贞,吉林永吉人(原籍河北),吉林女子师范毕业。她在辈分上是爸爸的学生,爸爸在吉林女子师范教高班的,妈妈却在低班,没教到。教到的高班学生里面有申若侠,后来嫁给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。那时候,流行高班学生同低班学生交朋友、合照相,申若侠和张桂贞就合照过,照片至今还保存,可是友谊早就“简直没有来往”了!女人之间的友谊真不可靠。妈妈在学校是风头人物、是篮球健将,那个时代女子到新学堂念书的不多,所以女学生很拉风。

爸爸在吉林六中有一个学生,名叫程烈,后来变成国民党政府中的名“立法委员”。据说当年因追求我妈,被校长我爸爸开除。师生关系中断几十年后,在台湾恢复,他的儿子程国强在台中一中也做了爸爸的学生,有一次被军训教官陷害,要开除,经爸爸力持交涉,才免于被开除。两代开除恩怨,竟成佳话。前一阵子程国强六十大寿,我是不参加婚丧喜庆的,但被骗去,席上邀我讲话,我说:“幸亏当年我爸爸追我妈成功,幸亏程烈失败了,否则这世界没有李敖,而我就是程国强了。”闻者大笑。

妈妈生我时候,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,这种情形,在那时代,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。中国汉朝就有“盗不过五女之门”(生了五个女儿的家,连小偷都不去偷)的话,一个媳妇,不老老实实生儿子,却一而再、再而三、三而四的生女儿,这成什么话?幸亏我应运而生,使妈妈立刻从“败部复活”,帮了她的忙不少。在生我以后,妈妈又故态复萌,连生了两个妹妹,那时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,直到最后弟弟出世,才算两权分立。六女二男,就是我的同胞情况。大姐李珉,北京辅仁大学毕业,名妇产科医生,嫁给周克敏,现在大陆;二姐李